

新

樸

學

社

叢

刊

金
德
建
著

兩
漢
尚
書

011.2
987



兩漢尚書源流及其篇目之新估定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嘉興金德建初稿

本篇談的尚書，起自伏生，至東漢馬鄭注的古文尚書爲止，梅賾僞古文不在內。範圍狹小，目的也不過想把兩漢尚書學真相畧爲整理出一個頭緒而已。說起尚書，漢時候的，就不一定是先秦之舊，如果能調查出先秦的尚書真相，來和漢時候的對照一下，相差的一定還遠，至於說到古史，那最古的尚書，也應當發信參半，但是我們要进一步一步不放鬆的研究，不能不從兩漢做調查的起點爲便。

一、伏生尚書和安國尚書

伏生和孔安國是漢初尚書最早的傳授者。史記儒林傳說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欲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常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伏生求其書，亡數

03817

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藝文志也說：

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

這兩派的尙書，後世用今文古文的名稱來區別他們；其實這種名稱很不妥當。既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壁藏古文，出壁之後，早就給孔安國譯成今文來行之於世，並不是古文了；伏生的今文，當初也何嘗不是壁藏古文經過了伏生翻譯以後纔是今文呢？同是壁藏古文，同是後來譯成今文，而一稱今文，一稱古文，名稱上實在不符實際。習慣上雖然這種名稱一時難以改革，不妨沿用，

總不要相信他們的區別就在這裏。真正的區別，的確還在籍數的多少上，「逸書十餘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餘篇」云云，就知道生伏安國的大別，是安國。尚書篇數多於伏生；二十九篇，還是相同。大概今文古文名稱的起源，一定是當時人見了安國尚書新出於壁中，篇數比向來的增多了，不能不有名稱來區別他們，便想到壁藏，便稱他古文，殊不知今文在未讀之前，皆是古文，古文在既讀也是今文了。伏生傳授張生及歐陽生，後來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安國傳授，也有四傳。（見古文尚書疏證卷二第十七）因為伏生安國的分別，只是安國比伏生多了十幾篇，並沒有絲毫今文古文的大道理在裏邊，所以他們的傳授，儘有混合的可能。例如：司馬遷初學今文，後亦從安國問故；漢書司馬遷傳，兒寬治尚書歐陽生，繼乃受業孔安國，（漢書兒寬傳）都是兼伏生安國的。如是安國四傳中，除了都尉錯而後立於學官的一傳為後人所僞擬（說詳後）而不計外，其餘三傳，只有孔氏世傳一系似乎照後人稱他古文的設法，應該守

着祖產，不與今文家來往，其實並不爾爾，在安國時候早已把他的尚書公開傳授了。至於今文的歐陽世傳之業，又出於兒寬所授，那也當然不是後人想像的所謂今文了。總之，安國古文的出現，姑且勿論他的價值比伏生高或低，事實上總是尚書上新材料的發現，當時治尚書的人，在孔安國，他是發現者，固然不免要研究，在向來傳伏生二十九篇的人，也不能不把這些新材料研究，因為同是研究者，所以他們的界限，實不能強分。把今文古文的名稱加上去，尤其不通。至於像後世所謂今古文之爭，你妬忌我，我攻擊你，這種行為在漢初更是沒有。所以自從安國尚書發現之後，在社會上所流行的，就是安國尚書，這是沒有。所以自從安國尚書發現之後，在社會上所流行的，就是安國尚書，這

安國尚書，當然伏生的二十九篇已經包括在內。

漢書記安國尚書發現時期，引起康有為崔適的懷疑。我以為他們所懷疑的是漢書的疏忽，有班固同時的王充論衡本補正。正說篇說：「至孝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如是恭王壞

孔子宅是景帝時，使使者取視是武帝時，把出壁時期和獻書時期，顯然的分開，足以糾正漢書的差誤，而釋吾人之懷疑。因為恭王壞孔子宅，自當在景帝時，閔若茲也會據論衡訂正過漢書，（尚書古文疏證卷一）但是獻書時期必定在武帝末，漢志說：「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言之鑿鑿，當屬可據，巫蠱在征和二

年，正是武帝末年。安國爲武帝世博士，假使安國親獻，恐怕早已立於學官，必待武帝末年，安國已死，其家人獻書，所以爲了一點巫蠱的事情，便不得立於學官。據此，漢志稱「武帝末，」確也有他的一部份根據，其差誤是把獻書時期和出壁時期混說而不能分清。

二、伏生安國外的尚書

史記記了伏生和安國的尚書之後，又輕輕底添上「蓋尚書滋多於是矣」一句，細玩此語，似乎說：安國尚書發現之後，逐漸還有發現，愈出愈多，不僅安國一家而已。

漢書景十三王傳記河間獻王也得古文尙書，但是據王國維的意見以爲：「頗疑卽孔壁之傳寫本」，（觀堂集林卷七漢時古文諸經有傳寫本說）所以河間獻王的古文尙書，是否卽與安國相同，頗難斷定。如果王氏的說法是不對的，那末，就是安國尙書外復出的尙書。

此外有秦誓一篇出於壁中，確是安國古文外的古文。劉向別錄說：「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於壁內，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書序正義引）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也說：「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說「後得」，說「武帝末」得到，就知道不會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內；但也不見得在安國尙書裏面。向來以爲秦誓在安國尙書裏面，也有以爲在伏生尙書裏面，都不對的。雖然秦誓出自壁屋，安國尙書也出自壁屋，二者彷彿相同，但是安國尙書不立學官，秦誓却「博士讀之，傳以教人」，是立於學官的，這就不同了；秦誓出自民間，安國尙書，出自恭王，民間與恭王，又是不同。所以漢初的尙書，分別起

來，伏生是一組，安國是又一組，而秦誓一篇又是伏生安國之外的一組。

照理另外應當還有一組。伏生僅二十九篇，安國僅十六篇，加起來只有四十五篇。但是尚書之有五十八篇數，兩漢儒者，人人共知，史記引五十八篇篇名具在，並沒有把九共來湊成十六篇爲二十四篇的曲折符會，（均詳後）如是在篇數上看來，伏生安國之外，另外還有尚書出現，是我們意料中所必然的。另出的應當有十三篇，除了秦誓，也還有十二篇，不過秦誓立於學官，事跡較彰，我們可以考見，其他的發現情形，難以詳知罷了。

然則秦誓發現時期照劉向所說是「武帝末」嗎？這也未必。獻書雜在武帝末年，出壁當在前。此若干年中，正如安國尚書出壁在孝景帝而獻書在武帝末。漢書蓋仲舒傳對策：「書曰：白魚入于壬舟，有火德復於王屋，流爲鳥，周公曰：復哉復哉。」這是引秦誓，仲舒對策在武帝卽位後之七年，已經有秦誓，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

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進賢者退」，說苑臣術篇：「太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而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故知秦議所引亦爲秦誓，元朔元年是武帝卽位後之十三年。據此二則觀之，秦誓之出土，最晚也。應當在武帝七年。

三、歐陽大小夏侯

漢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此卽伏生二十九篇中之盤庚（？）析爲三篇，而爲三十一卷，篇卽卷也。章句之外，又有經三十二卷，這三十二卷的數目，比較章句多了一卷，同是歐陽的尚書，何以篇數有不同？依我的意見，多的一篇，卽秦誓。歐陽時候的伏生尚書只有二十九篇，而秦誓並不在內，歐陽起來，把秦誓一篇并入尚書，（秦誓只有一篇，可以司馬遷所見爲證，後來馬鄭纔分上中下三篇）所以有經三十二卷。

武帝時尚書博士，前有孔安國，後有歐陽高，孔安國在武帝初年，歐陽高在武

帝末年，秦誓之獻，在武帝末年，正當歐陽高立爲博士，秦誓是立於學官的，所以歐陽的尙書因此就由三十一卷，增了一篇，成三十二卷。三十一卷是伏生之舊，三十二卷是歐陽的新增，尙書的演進，伏生與歐陽之判在此。漢書儒林傳說：「尙書……於是有歐陽之學」，這不是隱隱底告訴我們，尙書傳到歐陽，另有他的「歐陽之學」，跟伏生有些不同了。

漢書平當傳當引尙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承事傳於無窮」，顏注：「今文太誓之辭」平當受歐陽尙書於林尊，所以得聞太誓。叙傳班伯引書曰：「今文太誓之辭」，顏注：「今文秦誓之辭」班伯受小夏侯尙書於鄭寬中；小夏侯又事歐陽高，故亦得聞秦誓。此爲歐陽尙書有秦誓之明證。然歐陽之經雖有三十二卷，他的弟子雖也得聞太誓，但是撰爲章句，不能不把秦誓除去而仍爲三十一卷。此其故，大概因爲是立於學官的伏生尙書，不能不表示他守着伏生的師法只有三十一卷，秦誓一篇，儘管教給弟子，正式的章句上，却不能放上去。

，章句猶如教科書，而秦誓是教科書外的參考書，要是參考，便無書不可看了。或者「秦誓後得，其文淺顯」，不能明以教人歟！

知道了伏生與歐陽不同而有歐陽之學，再追進一層想到歐陽之後，何以又有夏侯之學，夏侯何以又有大小夏侯之分。那更確實了，大小夏侯不是章句二十九卷嗎！二十九卷者，仍舊是伏生的二十九篇，沒有更改，可見歐陽有秦誓，夏侯沒有秦誓，這就是歐陽和夏侯的不同，亦即歐陽和伏生的不同。至於大小夏侯的不同，小夏侯不是曾事歐陽嗎！與歐陽高登生關係，就與他的伏生相傳而下的本業不同，大小夏侯，由此而分。

據此而更經議古人，則王引之之經義述聞以爲歐陽有秦誓是對的，因此遂謂伏生二十九篇中早有秦誓，未免抹殺劉向所說武帝未得秦誓的話；龔定庵秦誓答聞知道伏生沒有秦誓，遂謂歐陽無增篇，就不然了，這都是不明其中消息而進退失據。陳壽祺左海經辨似乎丁見一點，但也不能確實道出，以書序爲在伏

生二十九篇中，說尤謬。蓋三子者，皆惑於後起的二十八篇伏生尚書之說而不能拔，再惑於信馬鄭之二十八篇以爲即伏生之舊；殊不知伏生尚書自有二十九篇，史記早說是二十九篇而不是二十八篇，至於馬鄭的二十八篇，只有馬鄭自以爲即伏生的，其實與伏生大不相同，（詳後）後人何必再替他去曲解呢！

四、尚書名稱的起源

「尚書」二字的名稱，先秦是沒有的，漢初也還沒有發生。凡先秦書中引尚書都稱「書曰」，而不稱「尚書曰」。因爲書者古代一切文書的普通稱呼，把這些文書之類的東西搜集起來，彙爲一編，賜他一個名稱叫做「書」。在書上而再加一個「尚」字，本不妥當，雖墨子兼愛篇有「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語，「尚書」二字聯用，先秦書中，僅見於此，但是用尚次對文，以夏書爲例，以商周爲次，那末「尚」「次」二字，均用作形容詞，形容書字，所以兼愛篇上的「尚書」二字，也不見得是書名。

最初稱他「尚書」是誰？據孔穎達以爲伏生。其實依我看是起於歐陽。劉歆七略說：「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君名之。」（見初學記二十一太平御覽六百九引）這是歐陽氏始名尚書之確證。所以後來的司馬遷，劉向，劉歆，班固，王充，馬鄭之徒，都稱「尚書」而不稱「書」了。歐陽以前未有尚書之名，所以較前的董仲舒的對策中引書稱「書曰」而不稱「尚書曰」，（對策時歐陽未顯於世）他的春秋繁露中引尚書共有六次，大都稱「書曰」，只有暖煖熟多篇稱「尚書曰」，同類相應篇稱「尚書傳曰」，大概董仲舒著春秋繁露，這幾篇作期較晚。但是我們倒因此反而可以看出始稱尚書的確是歐陽氏，鄭玄云：「大傳歐陽之徒所記」春秋繁露引書稱傳，一定是引歐陽的大傳，引歐陽的大傳而稱尚書，這豈不是「尚書」二字跟歐陽有特別關係嗎！

五、尚書的真篇名

然則伏生二十九篇的篇名爲何？安國十六篇的篇名爲何？所謂五十八篇者究竟

是那裏幾篇？關於這一層，我們向來所知道的是極不可靠，因為根據的是馬鄭所注東漢古文家的尙書，並不是伏生安國輩的尙書。尙書學的演進，到近數百年纔有人出而把梅賾的偽古文辨去，結果呢，梅賾的偽古文，果然除去，却仍舊落在東漢古文家的圈套裏，以爲他們的尙書就是伏生安國的尙書，伏生安國的就是先秦的尙書了。其實伏生安國的尙書是否就是先秦的尙書，似乎還有人注意，但是第一步先決問題，東漢古文家的尙書是否就是伏生安國的尙書，始終沒有人提出考慮過。

尙書之有五十八篇數，兩漢無人異議：

劉向別錄：「尙書五十八篇」（堯典正義引）

桓譚新論：「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

鄭康成：「經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雖然五十八篇名內容彼此各各不同，但是五十八篇數，是當時天下所共信無疑

嘗讀史記，知所謂五十八篇者，史記中具載無遺，既不多一篇，也不少一篇，豈不很希奇嗎！其中太甲三篇，盤庚也是三篇，篇名一一統計起來，剛巧五十八篇。包括伏生尚書，安國尚書，秦誓及其他。司馬遷把這五十八篇名完全記在史記裏面，大概是對於他完全有用，或者別有原因，亦未可知。雖所載各篇的內容頗有殘缺，其實已經很可以給我們：一則，知道向來我們所信的東漢馬鄭注之五十八篇實爲不可信，因爲他和西漢時候司馬遷所見的五十八篇已有不同；二則，也許因此會略爲增加了些尚書上的新材料。

不過這五十八篇也只能知道五十八篇之爲五十八篇而已，要分出那幾篇是伏生的，那幾篇是安國的，恐非易事。如果照他有的引全篇本文，有的只引篇名爲分別的標準，也無論如何不會對的。但是分別雖沒有方法，想來一定很重要，因爲安國尚書較得，在可信的價上，或者比伏生爲低。我希望我們能起來做再

追連一層的研究。

至於五十八篇中與今本相同的幾篇，文字也有不同，此則史記所見爲當時通行本，而今本爲東漢古文家改易之本，試舉例，如堯典：

「歸格于藝祖」五帝本紀作「歸至于祖禘廟」禮記王制作「歸假于祖禘」白虎通巡狩篇，公羊隱八年何休解詁並作禘，則知漢時尙書本作禘，至東漢古文家始改作藝。

「平在朔易」五帝本紀作「便在伏物」，然尙書大傳引亦作「便在伏物」。

「否德忝帝位」五帝本紀作「鄙德忝帝位」，按今本論語「予所否者」論衡引作「予所鄙者」張侯論漢世通行，包周注之，立於學官，爲今文，卽論衡所引。今本爲古文。故知五帝本紀之「鄙」字必爲當時通行之尙書。今本作「否」，適爲東漢古文家所改易者也。

此略舉數例，其詳當別爲文考之。

茲以史記中的尙書篇目，寫在下面：

1. 堯典（按史記全書中未嘗提及「堯典」二字，然五帝本紀曰：「尙書獨載堯以來」，則尙書中確有配堯的一篇文章可知，當時的篇名叫什麼，不可知，姑仍

稱之曰「堯典」。

- | | |
|---------------|--------------|
| 2. 甘誓（夏本紀） | 3. 五子之歌（夏本紀） |
| 4. 胤征（夏本紀） | 5. 帝誥（殷本紀） |
| 6. 湯征（殷本紀） | 7. 女鳩（殷本紀） |
| 8. 女房（殷本紀） | 9. 湯誓（殷本紀） |
| 10. 典寶（殷本紀） | 11. 夏社（殷本紀） |
| 12. 中謫之誥（殷本紀） | 13. 湯誥（殷本紀） |
| 14. 咸有一德（殷本紀） | 15. 明居（殷本紀） |
| 16. 伊訓（殷本紀） | 17. 肆命（殷本紀） |

18. 徂后(殷本紀)
20. 沃丁(殷本紀)
22. 太戊(殷本紀)
24. 盤庚三篇(殷本紀，吳世家)
26. 高宗之訓(殷本紀)
28. 牧誓(周本紀，齊世家，魯世家)
30. 分殷之器物(周本紀)
32. 微子之命(周本紀，宋微子世家)
34. 嘉禾(周本紀，魯世家)
36. 酒誥(周本紀，衛康叔世家)
38. 召詔(周本紀)
40. 多士(周本紀，魯世家)
19. 太甲訓三篇(殷本紀)
21. 咸艾(殷本紀)
23. 原命(殷本紀)
25. 高宗彤日(殷本紀)
27. 太誓(周本紀)
29. 武成(周本紀)
31. 大誥(周本紀，魯世家)
33. 歸禾(周本紀)
35. 康誥(周本紀，衛康叔世家)
37. 梓材(周本紀，衛康叔世家)
39. 洛誥(周本紀)
41. 無逸(周本紀，魯世家)

42. 多方(周本紀)
43. 周官(周本紀·魯世家)
44. 賄息慎之命(周本紀)
45. 頤命(周本紀)
46. 康誥(周本紀)
47. 畢命(周本紀)
48. 藥命(周本紀)
49. 書刑(周本紀)
50. 秦誓(秦本紀)
51. 立政(魯世家)
52. 魯誓(魯世家)
53. 晉文侯命(魯世家)
54. 君奭(燕世家)

六、張霸古文

4. 性質。漢書儒林傳曰：

世所傳百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書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授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

，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廼黜其書。

張霸尙書的性質，依我斷定大概是一部輯逸之書。把二十九篇折散，再從左氏傳等古書中搜集尙書的原文，以湊成百二篇，有幾篇亡的過多，輯起來只有寥寥數簡，不多幾行。但是那時候的輯佚，態度上就未必與近代相同，因此而把偽的成分竄加下去，也是勢所必然的，所以張霸書大約是一部份偽，一部份不偽，全偽是決計不會的，否者樊並，不當，周敞這輩人也不會「勸上存之」，成帝也不必「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見論衡正說篇）說「惜其文」就大可注意，不是張霸書也有相當價值嗎！況且霸書被黜的原因在樊並謀反，並不是偽不偽的問題，也許那時候有通行過一時。顏師古說：「存者立其學」，固是過甚其辭，或者也有幾分道理罷！

B. 書序的產生。百篇書序的非古，已經是千真萬確無容異議了，但是他產在什麼時候，偽者何人，還待研究。

就儒林傳記張霸的事情來看，知道張霸時候有書序。

就史記全書中看，並沒有提起過書序，司馬遷所見的五十八篇名具在，更足以證書序之偽造。

就劉向別錄來看，也只說五十八篇，並沒有所謂百篇書序。

如是，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概念，卽：書序的產生，前不得過於劉向別錄，後不得過於張霸。

按劉向卒在哀帝建平三年。然劉歆總羣書爲七略亦在哀帝時，向爲別錄應當前於歆爲七略，當在成帝時。漢書成帝紀所說：「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大概此時爲劉向開始做別錄，河平三年，是成帝卽位後之七年。張霸尙書，只知在成帝，年月不能詳考。據此計算，卽以張霸尙書在成帝之最末一年而論，上距劉向始爲別錄，至多不過十餘年，書序產生，當在這時期中。

書序的產生，何等奇特，產生的時間又剛在此狹小的範圍內，所以依我的意見，以為百篇之序就是張霸偽造的。他造了百篇，再造書序，造書序，正所以證成他的百篇，百二篇考，是百篇之外，加上了書序，而書序又分上下二篇。我們向來聽了班固的話，以為張霸采書序，似乎張霸之前早已有書序了，其實班固心中是書序孔子所作，根本上已經差誤，所說的話，當然不可據。

但是今本百篇書序中間經過東漢古文家竄亂過十八篇，（詳後七章（節））現在除了這十八篇，存下來的，與從史記中所考得的五十八篇，列表對照

書序篇名	五十八篇	
	中有	無
堯典	有	有
舜典	無	有
禹本	無	有
皋陶謨	無	有
五子之歌	有	有
湯征	有	有
汝鳩	有	有
汝方	有	有
甘誓	有	無
五子之歌	有	有
湯征	有	有
汝鳩	有	有
汝方	有	有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誓	典寶	仲虺之告	湯誥	咸有一德	朝居	伊訓	肆命	組后
有	無	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大甲	沃丁	咸父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竄甲	祖乙	盤庚	說命	高宗彤日	高宗之訓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有	無	有	有
微子	太誓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巢命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無	有	有	有	無	有	無	有	有	有	有	有

酒誥	有	多方	有	君牙	無
梓材	有	周官	有	冏命	有
召誥	有	立政	有	蔡仲之命	無
洛誥	有	賄肅慎之命	有	費誓	有
多士	有	亳姑	無	呂刑	有
無逸	有	君陳	無	文侯之命	有
君奭	有	顧命	有	秦誓	有
成王征	無	康王之誥	有		
將蒲姑	無	畢命	有		

單把張弼書序的篇名與漢初五十八篇對照，已覺其溢出於漢初如此之多，則其書內容僞的成分之多，也可想而知了。

弼書雖不存，從篇名上也可以尋出他的所謂分析采輯的手段。例如：尙書本有

君奭一篇，分析之而又有君牙，君陳。君牙，君陳的名目，五十八篇中沒有，蓄采之於終記：

坊記：「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于爾君于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緇衣：「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又：「君陳曰：未見堊若已弗克見，既見堊不克由堊」。

又：「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析寒，小民亦惟曰怨」。

按尚書在古代本無一定的篇名，（詳後附論）凡篇名都由後來稱引的人加上去的。君奭，君陳，君牙本來只是一篇。因稱引不同，遂有三種篇名。史記引君奭有「卒維茲有陳，保又有殷」一語，今本也有，陳字很可注意，歐陽馬鄭沒有注釋，大概作陳列或規模的意義。所以君奭一篇的命名，有的以為是周公告召公的話，奭是召公的名，君二字篇中很多，稱君奭來命篇了；有的以為這是

周公自以爲社稷之臣，有陳列之功，應該君陳二字命篇。至於君牙君陳更沒有什麼區別，牙璋者，發兵之瑞節，（周禮典瑞鄭注）牙旗者，打杖用的大旗，陳者軍旅之陳，是則牙也，陳也，意義極近，你既可以君陳命篇，我豈不可以君牙命篇。所以三名本指一篇，漢初人只用一名抱括，張霸多事，反而要分做三篇，這就是他的分析采輯的手段了。或者將以禮記所引君陳君牙之語爲什麼現在的君奭篇中沒有爲疑，我以爲這大約本是君奭中的句子而亡逸在外的，現在知道了，不妨再拿來補在君奭後面，作爲逸文，如「爾有嘉謀嘉……」一段，不是很顯明底周公告召公的語嗎？其他如：

左傳公四年：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這就是采以爲蔡仲之命。

禮記緇衣：兇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笱，惟干戈省厥躬。

又：《命命》曰，僭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這就是采以爲說命。此外采輯於古書者，還多，不枚舉。然而仔細考察，則采輯猶多未備如：

《墨子尚同中篇》：先王之昏，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秦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用天均。

《左傳定公四年》：分康叔以大路，……命之康誥，而對於股虛，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誥，而對於夏虛。

《史記殷本紀》……作咸艾，作大戊。

《略舉相年》，唐誥，太戊等篇名，都是百篇中所沒有，可見他的采輯未備。但雖未備，畢竟多少是有點采輯，所以當時也感動一部份人的相信。

等到樊並謀反張的尙書也因之被黜，百二篇之於社會，大致曇花一現，並無

若何影響。這時候張霸的偽尙書已經禁除，伏生安國的尙書雖有亡逸，然究屬真書，所以社會上通行的，一定是仍舊恢復到伏生安國之舊。不過百篇書序實爲張霸用心之所在，恐其時已具有牢不可拔之勢力，故得仍與伏生安國之尙書並傳。（詳後）然而因是而遂引起後來尙書第二次的重厄，不久就有本於杜林漆書立於學官的馬鄭注偽尙書起來了。

附論古代尙書篇名的不定

古代尙書沒有一定的篇名，我們只要舉幾個例來證明：

禮記大學，帝典日，克明俊德。此作帝典而不作堯典。孟子萬章上篇，帝典日，二十有八，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也是作帝典。可見現在的堯典，在古代稱帝典堯典都可，沒有一定。

國語周語，湯誓日，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呂氏春秋順民篇，桑林日，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無以一人之

不敬，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所引相同，當是一篇；但國語稱湯誓，呂氏春秋稱桑林。

禮記緇衣，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按此鄭注以爲古稱尹告今稱咸有一德可見篇名的隨便稱呼，尹告是因伊尹之誥而命名，咸有一德是採取篇中四個字來命名。

墨子明鬼下篇，禹誓曰：「大戰於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欲行天之罰也，左不共於左右不共於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戮於社」。按此甘誓之文，墨子引稱禹誓。

墨子非樂上篇。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磬莫以力，

湛樂於酒，滄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夫，弗用式。」簡朝亮曰：「史記曰：夏后帝啓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納，作五子之歌。益作歌以刺子也，周書嘗麥篇曰：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斯足徵矣，楚語云：啓有五觀。蓋「武」者「五」之聲近也，武觀卽五子之歌也。」據此五子之歌，武觀篇名又不拘定的。禮記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墨子尙賢中篇，呂刑曰：「苗民否用練折，惟作五殺之刑，曰法」，此引文相同，而一作甫刑，一作呂刑；禮記全書中所見，引起這篇的，都作甫刑，墨子全書中引這篇都作呂刑。

左傳哀公十一年，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此引盤庚，稱盤庚之誥。

禮記坊記高宗曰：「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讜」。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按此今無逸篇辭，坊記引之，以高宗名篇；但史記引高宗彫日

篇，也有這二句，今本沒有，不知坊記所引是無逸篇呢，還是高宗彤日篇，不得而知；如爲無逸篇，則顯然彼此所稱互異，如爲高宗彤日篇，則一稱高宗一稱高宗彤日也是不十分同，可見篇名之隨便稱呼了。

墨子尚同中篇，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與戎」。孫詒讓曰：「術令當是說命之畧字，禮記緇衣云：免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有厥躬。此文與彼引免命辭義相類，術說，令命，音並相近，必一書也」。劉師培曰：「孫說是也，免，隊，古籍通用，左傳襄十三年：夜入且于亡隧。禮記檀弓下鄭注引之云：隧或爲免。隧術亦通用，如本書耕柱篇，「不遂」即「不述」，備城門篇「術術」即「術隧」是也」。據孫劉二家之說，知術令即說命，名稱既可隨意擬定，則其假借改易便無不可矣。

推其故，大概尚書在古代只混稱一個「書」字，至多不過商書，周書，等界限而已，然而此種商周的界限似乎還是後起，論語引書僅稱書曰，尙未以時期有

分書。至於書之有題，更不消說後之又後。因爲後人想把一篇一篇的尙書都要加上題目去於是你想這個題目好，我私那樣好，未免人各一說的不同起來了。

七、官學古文尙書

到了王莽時候有所謂立於學官的古文尙書，漢書儒林傳曰：

安國爲諫大夫，授邵尉朝，朝授膠東甯生，庸生授涪河胡常少子，常授魏徐敖，敖爲右扶風椽，授王璜，平陵塗揮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塗揮皆貴顯。

揮又傳賈徽，徽傳子達，帝詔諸儒從達學，由是古文遂行。（後漢書賈逵傳）傳者頗衆，見於後漢書者多家。後來馬融作傳，（後漢書馬融傳）鄭玄注解。（後漢書鄭玄傳）其實此派尙書很多可疑之點：

（A）突出的可疑 大凡書亡了，就難有再發現，漢初五十八篇尙書，後來確有不少亡逸，何以到了王莽時候忽然全部活現，沒有遺缺。（雖缺武成，照理不

該只缺一篇）這是可疑之一點。

安國古文據漢書說是：「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一向不立學官，何以到了王莽時候忽然要立起學官來了。這也可疑。

以上兩點還是消極的理由，康有為偽經考舉出他們傳授世系的不可信，嚴密的偽託，給他一拆就穿到乾乾淨淨。其說曰：

安國傳寬，寬傳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猶當宣帝時為博士論石渠，高三傳乃至龔勝，則八傳矣，又安國再傳為簡牘，三傳為大夏侯勝，五傳乃至孔光，又安國四傳為小夏侯建，七傳乃至趙玄，玄哀帝時御史大夫，孔光為大師，是時名儒光祿大夫，則安國八傳之龔勝也，以今學八傳而至勝，都尉朝再傳而至胡常，即當哀平之世矣，即云老壽，何相去之遠乎。

再看做國師的劉歆，對於逸書意見如何。他說：「逸書十六篇，藏於秘府，伏

而未發」，這話就不大通，安國之後，據漢書說是又有傳授的，豈不互相矛盾嗎！而且這一世系的尙書也是劉歆手裏把他們立學官的，一方面劉歆又是這樣說法，真叫我們莫明其妙。至於偽經考說：「徐敖者，則傳毛詩之人，王璜者，則傳費氏易之人，胡常者，又傳左氏傳之人，蓋皆歆私人也」。秘書雖是應當秘傳，終究免不了我們的懷疑。

(B)本於杜林漆書 朱彝尊經義考曰：「西漢之古文，孔安國家獻之，未立於學官者也；東漢之古文，杜林得之西州，賈逵，衛宏，馬融，鄧康成輩爲之作訓傳注解者也。」夫安國古文前無所承，來歷不明，而安國古文，又早亡逸，亦非其所本，正在這時候忽然又有漆書古文出現，我們實在不能無疑官學古文即杜林漆書。理由也可約略說幾點：(一)兩種尙書突出的時期相同。(二)杜林也是劉歆王莽之黨。(三)因爲官學古文即杜林漆書，所以官學古文立於學官之後，社會上只有官學古文而沒有漆書，漆書也不再給人家提起了。(四)杜林是

扶風茂陵人，而訓傳官學古文者如馬融，鄭玄也都是扶風人，「扶風派」學者看重鄉誼，就把漆書立於學官而相率注釋訓傳罷！（五）後漢書楊倫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明言賈逵，馬融，鄭玄之尙書出於杜林，確然可據。（六）後漢書盧植傳：「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遂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盧植爲馬融弟子，所述如此，則彼之尙書，確爲漆書無疑矣。

（○）漆書的性質 杜林得漆書於西州，照地域上講，西州是荒僻之地，和齊魯不同。不應當在那個地方得到，所以得漆書的事情，已未必確實。

杜林傳載杜林對衛宏說：「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毋悔所學」。這不是杜林自稱與伏生安國的尙書不同嗎？

盧植傳：「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盧植口裏自然要

說他的「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稱當時社會上的人爲「流俗」，但是從他的話裏倒可以看出漆書和當時流行的文字不同，而爲當時人所不贊成，或者所不贊成的還不止文字上而已。文字不同，官學古文本於杜林漆書、當然也不同。我們把漢初的尙書，史記所引的，和馬鄭注的古文對照，如能字變爲克字，駟字變爲俊字……等等，不同的很多。漢初的尙書，伏生安國以今文讀之，早已變成「能明馴德」的今文本，史記就是直鈔，並不會經過今譯，事實上已經是今文了。所以漢初通行的沒有古文，伏生安國都是今文，真正的古文到這時候纔實現。東漢古文家把通行的今文本譯成古文，這種古譯，換言之，卽是改字，改的不僅尙書一種，很普遍的，鄭康成箋詩也曾改字，注周禮也有所謂「故書作其今作某」者，儀禮亦改從古字，注論語以包周之本并合齊古改正五十餘事，大概當時所謂古文經都經過了古文家的改字。改了之後，文字不同，於是有訓詁之學，西漢時沒有訓詁之學，因爲那時候根本上就不需要，有西漢人的語

言文字，讀西漢人的今文書，和周秦時候的人讀周秦時候文字的書沒有兩樣，東漢人要用東漢時候的語言文字來讀改成古文的經書，就不得不借徑於訓詁。一部爾雅是當時的「古文大辭典」以今文譯成古文，完全與爾雅合，後漢書賈逵傳：「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班固也說：「古文尙書讀應爾雅，大概尙書最古，最容易改，這班古文家用力最勤。逵集爲三卷，這三卷或卽爾雅的最初模型前面的釋詁，釋言，釋訓三篇也未可知，他們造了這部爾雅是叫人拿了爾雅去讀古文經，所以我們要認識古文經在漢初的真相，最好再照爾雅來一一今譯就興了。——關於這一點，暫止於此，以待來日另爲專文討論之。

(D)官學古文派的态度 劉歆說：「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移太常博士書)漢初的五十八篇尙書，傳到後來，已有亡逸，既不能有重出的希望，當然應

以不備爲備，但是劉歆的意見却不然，不贊成以不備爲備想把人家所不信的官學古文尙書來補足。衛宏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詞而已。」，這話的說說，早給前人折穿，顯似空道謠言，攻擊漢初傳下來的真尙書。鄭玄書贊云：「歐陽氏失其本義」，（虞書大題疏引）鄭玄大傳叙云：「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帝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鄭司農集引）這是鄭玄的攻擊歐陽，攻擊伏生，并攻擊大傳。

(B) 東漢五十八篇漢初有無對照表

	東 漢		初		
	漢	漢		無	有
樂典	有	無	禹貢	無	盤庚三篇
皋陶謨	無	湯誓	甘誓	有	高宗彤日(注一)
				有	西伯戡桀
				無	無

畢命

有

秦誓之篇

(注三)有

(注一)史公所見高宗融日篇馬鄭尙書中無，馬鄭之高宗融日篇，卽史公所見之高宗之訓篇。

(注二)史記所見并於堯典篇，不另立舜典篇目。

(注三)秦誓不分上中下三篇。

(F)東漢時候真尙書逸存的有幾篇，從上面對照，知道五十八篇中只有三十九篇是漢初流傳下來的，其餘十九篇不是漢初流傳下來，而爲馬鄭等石文家所竄加。但是我們另外還有證據可以知道流傳下來的真尙書的篇的確只有二十九篇，這證據是從那時候的尙書大 上看出來。尙書大傳決不是伏生所作，伏生傳尙書，已經九十餘歲，老不能行，再也沒有精力來做大傳，大概這部大傳是歐陽一派傳尙書者所記。他的篇數，鄭玄尙書大傳叙曰：

劉子致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

據此知大傳本來只有四十一篇，到了鄭玄竄加而增至八十三篇。大傳之本有四十一篇，無有疑義，漢志大傳也是四十一篇，可知八十三篇者，確爲鄭玄所加。但是他如何增法？這八十三篇之數，很可研究。考今書序百篇，篇名只有八十。十一（如九共九篇，盤庚三篇，咸又四篇，說命三篇，太誓三篇，太甲三篇）故百篇亦可稱八十一篇，鄭康成增大傳爲八十三，比八十一多二篇，此必鄭玄以大傳四十一篇增至最高之數八十一篇以符合書序，而所餘的二篇，卽書序分上下二篇，（張霸的書序也分上下二篇，故有百二篇）加起來適爲八十三篇。

八十三篇中既有序二篇而實爲八十一篇，就知道所謂四十一篇中亦必有序二篇而實爲三十九。因爲序與大傳必定是并在一起，纔引起鄭玄以爲書序有百篇而大傳篇數反少便把大傳增成八十三篇以求二者密合。如是三十九篇是大傳的實。

在篇數，大傳三十九篇，即可證當時真尚書逸存的篇數亦必爲三十九篇無疑。八十一篇以篇名計，故雖八十一篇而篇數實爲百；而三十九則以篇數計而篇名僅三十五。二者計法略有不同，但也有原因：三十九的計法，不管重複，只管篇數，是兩漢的通例如此；稱百篇爲八十一，莫非因爲稱了百篇之後，加上書序，爲百二篇，未免與張霸百二混名，而不得不稱八十三篇罷！

(G)竄入者有幾篇 當時逸存的真尚書只有三十九篇，前面已經證明了，那末其餘的十九篇一定是馬鄭之徒的古文家所僞造無疑，但是我們另外還有證據。

鄭玄書論說：

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以十八篇爲中侯。（書序正義引）

尚書的篇數最多不過如張霸的百篇，加上了書序上下二篇，也只有百二篇，今

鄭玄之說有所謂百二十篇者，較百二篇且多十八篇，此十八篇深歷不明，殆鄭玄輩所加入無疑。十八篇的篇名我以爲就是禹貢，洪範，九共，泊作，……等十九篇而其中舜典不計，因舜典割堯典之後半爲之，或舜典之獨立爲一篇名，張霸時早已有了，所以十九篇如實僅十八篇。正在鄭玄他們的時候尙書突然增加了十八篇，這十八的數目，適合他們竄入尙書中的禹貢洪範等十八篇之數，所以我認爲這是他們造僞的確證。因爲他們加進十八篇去，未免與百篇之數不合，所以不得不昌言尙書百二十篇。於是再將百二十篇中提出十八篇以爲尙書中候，此十八篇當然不就是他所加進去的十八篇，而爲從本來的百篇中所提出來的。如是可知所謂百二十篇中以百二篇爲尙書以十八篇爲中候者，完全是他們從百篇中加進十八篇僞書，而割出十八篇真書，以完成他們造僞的一套把戲，張霸以後再度造僞的把戲。推此言之，現存百篇書序中已有十八篇爲僞，非

張翦的原樣了。

(丑)見存二十九篇中竄入諸篇偽證 向來以爲漢初五十八篇流傳到現在，中間一部份因爲馬鄭以爲逸書而不注的緣故遂致亡逸，只存二十九篇，此二十九是伏生之舊。從上面的證明我們纔知道通常所謂五十八篇，還只是東漢古文家的五十八篇，現存的二十九篇亦不盡是漢初之舊，其中臬陶謨，禹貢，西伯戡黎，洪範，金縢五篇爲東漢古文家所加進去的，這幾篇在尚書之中極有可疑之點，不僅文體的特異而已。

禹貢一篇，先秦書中，從未引及之，本來和尚書毫不相干。近人衛聚賢禹貢考以爲作於戰國末年，西元前三一六至二九〇年之間。伏生生卒年歲，不可詳考，近人陳張聲伏生年表假定百歲，自周赧王五十五年起，至文帝後元三年止，則西元二六〇至一六一也。如果他們的論斷是對的，則伏生之時，距禹貢作期極近，伏生不至如此糊塗，竟把當時作品拉到尚書裏去。況且禹貢作地在秦，

伏生爲秦博士，其爲僞作，伏生當更明知，更不宜以之混入尙書。

洪範一篇似乎漢人很看重他，初則五行說盛行根據於洪範，繼則劉向竟爲之作五行傳，因爲看重他，所以東漢古文家就把他混入尙書。劉向作洪範五行傳，可知劉向時洪範還是單行的一篇，和尙書不混。至於金縢一篇王莽時曾有擬金縢之作，莽傳有赤帝璽集，金縢有發日某，文法相同。莽傳：「莽作策，請命於泰畤，載璧乘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又：「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鄠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又：「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傳中對於別篇不言如何，這幾篇却特別注意，其中不無蛛絲馬跡可尋。漢辭司馬遷傳說：「遷嘗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這句話極無稽，司馬遷時並沒有什麼今文說古文說，他的話更增加了我們對於這幾篇的懷疑。

至於史記中本沒有這幾篇，何以偶然也有和這幾篇相同的記載？這大約可有三種不同的解釋：

1. 史記中本沒有這幾段文字，後人竄入。

2. 本來沒有這幾篇文字，只是一種傳說，經過了史記的采取，加了潤色，變成很優美整齊的文章，後來東漢古文家見了，以為記事也很古很古，就割取拉入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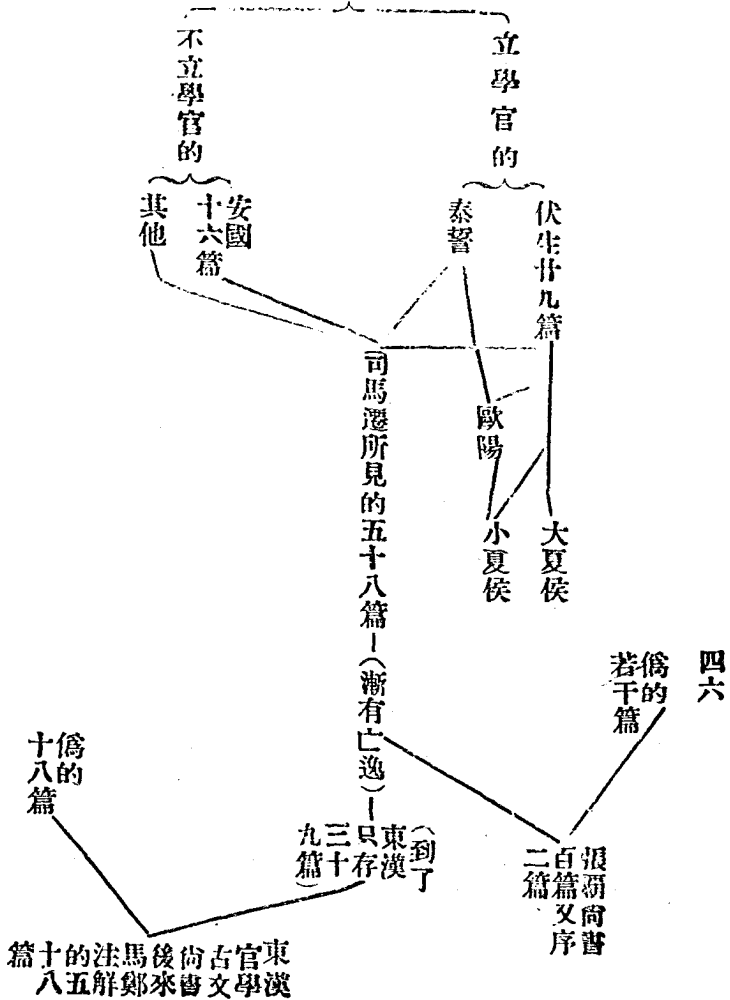
3. 以為戰國末年（其實不一定是戰國末年，漢初也未可知）確有這幾篇文字，但不在尙書中，司馬遷作史記采及之而已。

這三個假設，不知究竟那一條對，尙待進一步研究，我個人是比較贊第二說。以上所說這五篇的偽證，略之又略，詳細調查，應該還有許多證據。

八、結論

全篇大意，可立一表以明之，如下：

漢初五十八篇



東晉梅賾的偽古文尙書，早經前人論定了。如果以上的推論還可成立，東漢馬鄭注的五十八篇也不可信了；漢初的五十八篇也知道了。那末我們就相信此漢初五十八篇以爲自古以來就如此嗎？不，不，這不過是伏生安國他們的尙書，最古的尙書，傳到後來，經過長時期的變化，想必離原形不知多少遠，剽到，伏生安國手裏的幾篇，當時又不完全「傳以教人」，「傳以教人」的，又用譌讀來今譯過，不是先秦的文字了。等到東漢古文家起來把尙書竄亂不算，還要加以今文譯成古文，想回復他在先秦的原形，於是文字上又經過一度變革。試舉一例，如：堯典「平章百姓」的平字，在漢初不用平字，史記引作「便章百姓」尙書大傳引作辨，毛詩采菽「平平左右」，傳「平平辨治也」，釋文「平平韓詩作便便」使辨相通，都是今文；說文「采辨別也，讀若辨，乎古文采」，說文讀若的讀字，和史記「孔安國以今文讀之」的讀字相同，意義是古字漢世不通行，漢人用今翻譯當作某字替代，（此層說來太繁，另有文討論之）所以漢初今文尙

書「辨」或「便」，古文家以爲卽古文「采」或「乎」字，就依之古譯，流傳到現在經過不知多少次的傳寫翻刻又成一「平」字，如是漢初的今文固然不是先秦的，古文家的文字，似乎照理可信，但是古文家的文字如何，近幾十年來自吳大澂而後的考訂許書，成績昭著，他們所靠着的許書，已不盡可靠，他們的古譯，也難保沒有差誤。古譯的志願，平心而論，確鑿可嘉；譬如有人把尙書譯成白話，白話是現在的今文，如果政府命令只准通行白話尙書，禁止文言，豈非學術上大受損失，五百年後，又有深通文言者出，再從白話譯成文言，不是很有益的事情嗎！古文家與今文家的區別，經說的不同，因爲時代先後，思想演變，經說自然因之而異，並不奇怪，真正的區別，的確還在文字的今古上幾部古文經，我們略爲看出許多古字是漢時所不通行，顯係初是漢字，經過古文家古譯後的字，如毛詩和三家詩上最容易看出，不過古文家這一點古譯的志願，在實踐上却不大高明，學識和方法的不精密，結果愈弄愈精，變成今不古不古的。

經書，也是勢所必然的，加之漢後又不免被人竄改，古文家的真面目也未必完全存在。我們要找出今古文字的區別雖匪易事，究竟總是我們應走的一條大路，前人用訓詁音韻以及假借之類含糊講通了，切實講起來，還很勉強，我們在這個時代，應當緊接上去進一步從今古文字演替的關鍵上研究，纔可以看出書籍變革的真相，是很重要的事，不僅尙書一書而已。

——完——

贈

爲內政部大務司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社務啓事

本書爲金君所著司馬遷所見書考中之一節，此考係從史記中考得書名七十餘種，爲史記補藝文志而作，其尙書一節按語分兩部份，一、先秦尙書，二、兩漢尙書，本書卽第二部份也。

本年度社員著稿有陳廷憲之未老集；虞愚之因明學大綱；羅鶴泉之三國文學研究；張惟中陳松茂等之文字論集；陳松茂之常州方言考證，契文札記；金德建之兩漢經學家之翻譯事業；庚辛之古代思潮論。

陳松茂君近自某收藏家得見甲骨多片，並撫臨之，刻正在研究中。

本社編輯處

6
801021

6

301

社員地址遷改者：

羅 鶴 泉：
上海持志大學

陳 松 茂：
上海江灣路七百廿號

金 德 建：
廈門五洲大藥房轉交